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史 镜

# 中国在构建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努力

□ 陈新生　吴　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战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轨道。1942年1月，中国参与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成为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战争后期，中国作为东方人民的代表，对构建战后国际体系与秩序框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想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为根本出发点**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社会的空前浩劫。特别是二战，84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卷入其中，军民伤亡超过1亿人，经济损失4万多亿美元。战争进行当中，避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建立普遍而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就成为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而自1840年以来屡遭列强侵略的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追求则更加坚定迫切。

中国认为清算法西斯战争罪行、铲除法西斯战争根源是战后世界和平的前提。1943年2月，中国提出，“如欲获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须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为太平洋上之祸患”。因此，中国提出不单独与日本媾和，剥夺日本非法侵略所得；追究日本战争责任，设立国际军事法庭，惩办战犯；对日本进行军事占领和民主改造；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等，根除日本再次侵略的野心和能力。

同时，中国坚持不扩张原则。1941年8月，美英公布《大西洋宪章》，其第一条为“两国并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中国表示完全支持。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中国婉拒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将琉球群岛归属中国的提议。12月公布的《开罗宣言》再次明确“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日本投降后，中国陆军第1方面军入越接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在受降结束、移交协议达成之后马上撤军。

中国还对日本采取了“以德报怨”态度。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就美国内废除天皇制的要求询问中国看法时，中国表示事关日本政体，应在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以免造成民族间永久的错误。战争结束时，中国提出“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对日本不采取报复主义，不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用宽大政策，避免冤冤相报，形成长久和平。在对华战争赔偿上，中国也根据日本当时的赔偿能力而不是依据实际的损失确定了索赔数额。

中国不仅主张严惩日本法西斯，同时也给日本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与一战后战胜国一心分赃、苛刻压榨战败国的行径有着根本不同，显示出中国缔造和平的真诚、不念旧恶的气度和着眼长远的胸襟，为真正实现战后和平与安全创造了前提。

**以建立强有力的联合国为集体安全制度核心**

一战后建立起了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集体安全制度。但由于国联缺乏普遍性和权威性，导致面对法西斯侵略时无所作为，因此早在1939年中国就提出要建立“一种包括全世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并强调“和平机构应是一强有力的永久性机构”，“以愈坚强有力为愈宜”。

中国主张联合国和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认为，根据和平精神和集体安全原则，联合国应是一个世界性组织，是国际和平的基础，位于其他地区组织之上。地区性组织是联合国的一部分，其行动受联合国的制约。同时，中国强调世界和平机构以安理会为中心，并在1945年的旧金山制宪会议上，提出了扩大安理会权限的三点修正案：一是发生紧急事态时在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办法；二是采取办法实现国际法院的判决；三是确定向安理会提出请求的非联合国会员国应当享有的权利。其中第一和第三点被吸收进联合国宪章中，从法律上明确了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承担更大责任。

中国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实行大国合作和大国发挥特殊作用原则。鉴于国联的教训和战争中各国的实力对比，中国非常重视大国间的合作，指出“盟国之间的这种和谐、团结不应只限于战时，还应持续到战后”。1942年7月，中国提出“中、英、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匪但理所当然，且抑责无旁贷”。同时，中国还把大国维护和平的能力与其特殊责任相联系，提出“在未来国际和平机构中大小会员国一律平等原则之下，承认大国特别的权利与责任”。在开罗会议上，中国政府赞同美国政府拟定的由11国组成执行机关，由美、英、苏、中任主席团成员的办法。中国还提议国际组织投票应包括常任理事国才有效，投票原则由全体一致改为多数原则。最终，《联合国宪章》授予美、苏、英、中、法“否决权”，明确了五大国在国际安全中负有特殊责任。这种安排，尽管在战后遭遇了种种曲折，但它基本保证了联合国的权威性和行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安理会采取轻率行动，维持了世界的整体和平。

**以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为重要原则**

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主义国家将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纳入其全球性殖民体系。到二战前夕，亚非拉地区只有31个独立国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中国曾饱受殖民主义之害，特别关注和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坚持民族自决和非殖民化是中国的基本立场。1941年8月，美英将民族自决原则写入了《大西洋宪章》，中国称宪章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但由于宪章未提及日本，中国于1942年1月提出三点补充：一是大西洋宪章，特别是解除各侵略国武装和民族自决等原则，适用于全世界；二是日本的领土以1894年前为准；三是各民族各种族平等。1943年，中国在对美宣传中强调“战后太平洋各国应以开发西太平洋沿岸之亚洲未开发之物资与解放其被压迫民族，使世界人类得到总解放为第一要务”。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解放的良好愿望。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中国坚持给予亚洲国家独立。尽管英国强烈反对，中国坚持将“使朝鲜自由独立”写入《开罗宣言》，为其独立赢得了国际法保证。在中国的积极努力下，中美达成了在二战后共同协助越南和泰国独立的共识。罗斯福还提出，英国必须给印度人民以政治的独立。这极大地鼓舞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

中国还促成将民族自决原则列入联合国宗旨，为废除殖民制度提供了法理依据。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英、美主张托管的目的为“自治”，法国草案企图不扩大托管领土范围，根本未涉及殖民地自治问题。中国则指出：“被委任统治地不必分甲乙丙三等，一律以助其达成自治为共同宗旨，由国际机构随时斟酌情形予以自治或独立。”中国提案的目的，是要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废除殖民制度，因而遭到了美、英、法、澳、南非等国的强烈反对。但中国“态度异常坚决”，形成“与英美尖锐之对立”。美国代表会外协商时提议，用在托管理事会给中国一个永久性席位来换取中国同意美英的意见，但中国表示并不想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殊好处，只是衷心希望把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由于中国的坚持和苏联以及广大中小国家的支持，民族自决被列为联合国宗旨，促使托管领土“趋向自治或独立之逐渐发展”被写入宪章托管目的条文中，成为国际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中国也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前途的象征和希望的源泉”。

**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准则**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强权政治的欺凌，格外珍惜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特别渴望实现平等的国际交往。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没有追随传统大国的强权政治逻辑，而是自觉承担起为东方弱小国家和民族代言的重任。1944年5月，在受邀参加敦巴顿橡树园联合国筹备会议时，中国表示“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其意义”，力求在战后世界的安排中实现公平正义。

中国多次为弱小国家申诉。特别是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国提出了与自己有类似处境的国家和民族特别关心的七点补充意见：必须根据正义与国际法原则维持和平与安全；保障各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明确侵略定义，列举侵略行为；组织国际空军；由联合国大会主导国际法修订，促进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安全；国际法庭应能强制制裁；促进教育和文化合作。这些意见“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弱小国家的利益”，反映了深受强权政治之害的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心声。

中国还积极争取弱小国家的权益。旧金山会议上，中国提议根据正义和国际法原则解决国际争端。而英国人反对，认为国际法内涵不明确，其原则只能导致争论。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最终将这一原则写进了联合国宪章，为弱小国家权益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上，英国要求以各国参加维持和平与安全事业的程度为标准，目的在于增加中等国家特别是英联邦国家的入选机会。对此，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力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必须考虑地域平等分配原则，给欧美以外的小国、弱国以更多更公平的机会，削弱传统的强权政治。最终，中国提案被大会接受。旧金山会议上，墨西哥、埃及、菲律宾、新西兰等中小国家提出了界定侵略行为的提案，中国是唯一支持的大国。中国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表达了饱受强权政治之害的人民的心声，对联合国的公平和公正做出了独特贡献，是其他三大国难以替代的。

在构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中国顺应历史发展和时代潮流的先进理念，对二战后世界的和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至今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 应能“下马草军书”

□ 杨振辉

在中国古代，正是由于历代统治者都明白可以马上争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因此，十分重视并通过考核经典掌握程度与写作才能高低来选拔任用官员，从而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政权中枢。汉武帝时“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汉武帝亲阅并拔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等为官，“汉家得贤，于此为盛”。唐朝的一介布衣马周，仅凭起草一篇奏议就平步青云，终成名相。在中国黄金时代的北宋，高官多为博学鸿儒，尽管也党争不断，却彼此都以君子自励，并不残酷摧残异己，比较文明的政治缔造了国家的空前辉煌，国富民强在世界遥遥领先。但自从宦官童贯执掌重权后，国事蝇蝻，北宋急遽败亡。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范仲淹语）。童贯八面玲珑，却不是学高品粹之士。这就严重践踏和颠覆了好学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反复叮嘱的“宰相要用读书人”的原则。重视考核学习和写作才能，这引导、激励了历代社会精英“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书，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刻苦学习自然蔚为风气并且长期持续浓厚。

对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中国古代官员来说，写作只是他们的基本功。春秋时期甚至要求大夫要有九种文体的写作才能，即“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体现。”言语表达能力可以映照其人的智力，包括学习、记忆、思维、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批评有的人讲话“云遮雾绕，玄之又玄，其实是能力不够、水平不高，既弄不明白问题的是非对错，又怕承担责任，所以只能装腔作态，故作高深”。从政是一项极具复杂性、艰巨性的工作，没有较高的语言文字能力也即超群的学识、智慧、魄力等综合素质，必然力不从心甚至事与愿违。所以，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就是说优秀的政治家，往往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家。

伟大的政治家必有非凡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必有非凡的表达。这也就是柏拉图坚称的，要么哲学家成为执政者，要么执政者成为哲学家，理想国才能出现。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给这一理论以有力的印证。他既宏图大展，又人格高尚，巨著《沉思录》流芳百世。“在二战中拯救英国和世界的铁血英雄”丘吉尔，1953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少有这样的幸运，胡适因而感叹：“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领袖资格，是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其余那许多革命伟人，享有盛名之后便丢了书本子，学识的修养就停止了，领袖的资格也放弃了。”这就是说，领导者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品格素质、文化专业素质、组织能力素质，需要多方面长期的修炼和不断刻苦学习来提高、保持。能力靠思维来养成，而修炼思维能力最基本的途径就是结合工作勤奋学习并笔耕不辍。学习可以提升写作水平，写作必定促进学习深入。如此循环才能不断增长知识，磨练意志，巩固学习成果，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说，那些动辄依赖秘书的官员，往往是思想贫乏或思维混乱的平庸之辈；那些讲话只会照本宣科、人云亦云、枯燥无味者，往往缺乏变革意识、开拓精神或创新能力，工作中往往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

毛泽东因而极其重视领导干部的写作能力训练，他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并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规定，要求全党严格推行。他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可以说，重视写作使我党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辉煌胜利。在淮海战役的65天中，华东野战军的“秀才”们一共创作了40多首歌曲，后来选择7首有代表性的歌曲，配上朗诵，连成《淮海战役组歌》，并在押送56名国民党高级军官战俘赴后方时演唱，赢得了这些特殊观众的热烈掌声。他们深有感慨地说：“听了你们的歌，证明我们是必败无疑的了。你们能文能武，人才出众，战争还没结束，你们的歌已写出来，唱起来了，真叫人佩服！”

20世纪起，各种论战此起彼伏，雄文一出，震聋发聩，摧枯拉朽，风靡一时，于是人们对写作社会功能的重视也与日俱增。战火纷飞中，毛泽东激情澎湃地在延安礼堂纵论文艺创作，还作出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的妙喻。这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宣称“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的言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期的蒋介石也在1950年国民党的一次中常委会上，拿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无悲愤地说：“就是这么一本小小的书，把我们赶到海岛上来了。你们写得出来吗？”可谓创痛巨深、懊悔不已。

有所思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将相和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

中华春秋

# 大唐的魅力

□ 王丹誉

唐德宗元贞元年（785年），德宗皇帝收到于阗国国王曜的国书。曜在国书中向唐德宗说明：“我哥哥名叫胜。当初，他把王国托付给我，现在我恳请重新立我哥哥胜的王子锐（在唐侨居）回国继承王位。”德宗皇帝就找到锐，授他检校光禄卿，让他回国继承王位。谁料到，锐却因来唐多年，已经乐不思蜀了。锐王子坚决回绝回国当国王的建议，并且说：“我叔叔曜已经管理国家多年，深受全国臣民拥戴。而我在华夏的京城长安生活这么多年，已经不了解家乡故国的风土人情，我不能再回去了。”德宗皇帝深受感动，就封这位留恋唐朝竟然不回国继承王位的于阗国太子锐为“韶王咨议”。

其实，这种佳话早在初唐就已经广为流传。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二月，自古和中国没有通好的结骨国（回纥西北三千里古称坚昆，汉初属匈奴，魏晋自称结骨）俟利发（国王）失钵屈阿栈归降并到长安朝拜唐太宗。太宗在天成殿设宴款待，就指着他对群臣说：“武德年间，我在长安城外渭水桥头连斩三个突厥大将的首级，自己认为那是很大功劳。今天这种人就在席间，众卿看到就不必害怕。”这位国王就请求太宗，给他封赏一个唐朝的官职，并且说：“我若能手执唐官官员的笏板回到故国，实在是子孙万代的荣幸。”于是，太宗就授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隶燕然都护。

史书记载结骨国“其国人皆长大，赤发绿睛，有黑发者以为不祥”。太宗当场向群臣解释，要大家“不以为怪”。显然这些“四夷之人”的确不同于中国人的种族。

外国人归服唐朝决不是纯粹为了功利，很大程度上对唐朝已经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仰。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数百名在唐朝当官和来唐朝贡的世界各国人，听到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的噩耗，无不悲痛欲绝地大哭。

等到将太宗葬入昭陵之后，阿那史社尔（突厥王族，曾自封可汗，后归唐授左领军将军）、契芯何力（原本铁勒可汗，归唐授左领军将军）恳请自杀殉葬太宗。刚刚即位的唐高宗派出使者向他们宣谕太宗皇帝遗旨：不许殉葬。最后，就把这些曾被太宗生擒和制服的包括颉利在内的各国国王、各部落酋长共十四人，全部被雕刻成石像并在身上铭刻姓名、官职，排列在昭陵的北司马门内。以此成为唐朝一种皇帝的丧葬制度。

唐高宗之世，有70多个国家与唐保持友好往来。高宗驾崩，有11个国家派使臣前来参加葬礼。其中有61位外国国王参加高宗葬礼——乾陵会葬。就依照昭陵之制，为这61位国王刻立石像，背刻国籍、姓名、官职等文字，立于乾陵朱雀门两侧，史称“六十一宾王（蕃臣）像”。“宾王”本意就是宾服来朝的各国国王。宾王像的形象各不相同，长相有的高鼻深目，有的络腮胡须；穿着各异，有的披发左衽，有的足蹬皮靴……他们在乾陵风雨中屹立千年，共同见证着大唐的高度开放性和强大感召力。

由此延袭成风，世界各国无论因公朝贡（出使），还是因私经商，皆仰慕大唐而侨居长安、洛阳等地，按惯例“胡客”无论在唐做官、经商均由唐政府供养。代宗大历年间仅“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到了德宗贞元三年（787年），生活在长安的“胡客”中已经拥有田产者竟多达4000多人，人数之众甚至让唐政府都供养不起了。宰相李泌深知：胡客留长安时间长者达四十余年，均娶妻生子，买田置宅，有的竟然做起生意，在长安生活得十分安逸竟不愿回国。于是，唐朝命官员调查，“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们集体到宰相府上访。宰相李泌说：“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者，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就这样，胡客还是没有一人愿意回国。后来，李泌把这些外国人全部分配给神策两军。

胡客在唐朝任宰相者也司空见惯。《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记载：自唐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即白敏中）入拜相，次毕相诚、曹相确、罗相邵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外国人来唐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当官，也能名正言顺地参加科举。在唐朝的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无论官费生还是私费生均可参加唐朝的进士科考试，中举业的新罗学生有58人。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宾贡科”，特别照顾外国来唐的考生。所谓“宾贡科”，指进士科考生的特殊来源以及考试和录取的特殊方式。很多留学生考取了唐朝的“宾贡进士”，如新罗的崔志远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外国人来唐，无论是出使、留学、科举、经商、当官，都能够获得成功，做文官可以位极人臣，武官可当宫廷卫士、将军、镇使，甚至还可以公开传教……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大唐制度的优越，强大的自信，也体现出大唐高度的开放，极度的包容，因此大唐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